

第八章 关于徐润评价的若干问题

晚清实业家徐润生活在 19 世纪早期至 20 世纪初，当时的中国社会处在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徐润是一个由买办向民族实业家转变的典范，一方面体现出作为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爱国、创业、开拓、创新的爱国精神、进取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存在自身的不足和缺点，反映出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这就是徐润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和内涵。

第一节 徐润的现代企业家精神

晚清民族工业从它一产生就面临许多艰难困厄，只有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能担此重任，因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发展的动力。费维恺在《中国早期工业化》一书中在分析晚清的政治思想时认为，晚清的思想家已经“懂得充足动力的重要性。”^① 费维恺在这一书中还引用了最近 10 年的经济发展研究成果：“真正的动力和契机，很大程度上存在于民族的政治抱负和国家的机能之外”，真正的动力是“个人首创精神和企业家功能在日益普及的风气中的运用，并

^① 前揭《中国早期工业化》，第 41 页。

不仅仅限于上层。”^① 郝延平教授认为“企业家有时也可以下定义为革新家。”^② 熊彼特等经济学家把企业动力确定为企业家的冒险和创新精神^③。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得出：无论是史学家费维恺先生、郝延平教授，还是经济学家熊彼特先生和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虽然表达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把企业的动力均定位为企业家的冒险和创新精神。诚然，“企业家的冒险和创新精神确实是企业发展的主动力。”

但笔者从环境、时代和企业三者考察近代的企业家徐润，得出成功的企业家应该具备三种精神：创业精神、创新或冒险精神、民族精神；也就是三种动力，即基础动力、基本动力、升华或高级动力。创业精神是基础动力，创新与冒险精神是基本动力，民族精神是升华动力或高级动力，三者有机结合，集中地体现了一个企业家的精神。

徐润正是凭借这三种精神动力成功地参与并实际主持 1873—1883 年轮船招商局的工作，创办晚清保险业，积极投身晚清矿业，受清朝委派先后办理香山天华银矿、开平林西矿、热河承平银矿、建平金矿、永平金矿等，为晚清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而徐润的这三种精神则源于十六年的买办生涯和五年的自营商业活动，正是这二十一年的艰苦环境、艰苦工作和艰苦磨炼培养和造就了实业家徐润的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和民族精神。

一、创业精神

（一）买办时期的主奴关系和寄人篱下的卑微激发了徐润的进取精神，并养成其忍让、宽容、乐观、豁达的性格品德

19 世纪的中国买办实际上地位非常低下，主奴性质的雇佣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文化中贵贱和尊卑观点深刻影响下的晚清买办对洋行表现出绝对服从和忠实可靠。容闳在 1858 年婉辞宝顺洋行命其担任日本长崎买办时说：

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予固美国领袖学校之毕业生，故予极重视母校，尊之敬之，不敢使予之所为于母校之名誉少有辱没。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以予而为洋行中奴隶之首领，则使

^① Lock William W.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Growth and Strucural Change, 1868—1938, Princeton, 1954, pp. 603.

^② 前揭《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 179 页。

^③ 前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 131—134 页。

予之母校及诸同学闻之，对予将先如何之感情耶？人虽有时困于经济，不得不贱役，为稻粱谋，第予之贫乏尚未至此^①。

容闳的思想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在当时的士大夫心目中，买办的职业极为卑鄙，地位近似为奴隶。事实上在具体的工作中，买办的地位是非常可怜的。徐润于咸丰十一年（1861）代为“主账上堂督理各职”，宝顺洋行行东韦伯训话：“今君乃总行中华人头目，如有差错捺报，惟君是问。”^②徐润是韦伯的亲信买办，其伯父徐钰亭又担任“主账上堂督理各职”多年，在这种人际关系下主奴关系还如此淋漓尽致，其他买办就可见一斑。徐润的好友怡和洋行大买办唐廷枢，十年买办生涯得出的结论是充满不信任和屈辱。唐廷枢1863年开始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分管金库，到1865年2月，怡和洋行就筹办钱庄，限制他的权利；1866年11月，林此奎、葛仰高事件，不信任感日益加强，唐廷枢的权利只到应付零星开支的地步；1868年因附股公正、北清轮船公司并充任华籍董事，遭洋人非议，怀疑他在洋行有贪污行为；1871年对唐廷枢的怀疑变成现实，其罪名是盗用洋行库款进行自己的商业活动。可见，无论是徐润，还是唐廷枢及其他买办，面对这种卑劣的地位，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心理上一方面是表示愤慨，另一种心理就是刻苦好学，奋发努力，取得好的业绩博取主子的欢心与赏识，并以此作为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由于买办是在洋行工作，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伎俩非常了解，可以说买办是生活在资本主义肚子上的细胞，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五脏六腑”都一目了然。因此许多买办在从事买办的过程中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就是典型代表。

徐润到宝顺洋行工作后，因自己伯父的庇护，加之自己的努力，表面上看是老板韦伯的亲信，与洋行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但却掩盖不了他们之间的主奴关系及寄人篱下的卑微。为了摆脱命运的十字架，他只能刻苦好学，努力工作，百折不挠地去面对现实，面对工作。这反而使他在充当买办期间逐步形成实业家的创业精神：刻苦学习先进技术和知识见贤思齐的精神；忍辱负重、百折不挠、乐观向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咸丰二年（1852年）徐润到宝顺洋行学艺。他不但“学丝、学茶，不分彼此”^③，“春学丝缕，秋学茶；”^④而且“黎明即起习

① 前揭《西学东渐记》，第106页。

②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8页。

③ 前揭《洋务运动》，第8册，第88页。

④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4页。

字数百。又学算于阙筑甫。”^① 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连洋行的外国技师都非常赞许：“韦伯氏见余之勤也，许为志不可量。”^② 早年形成的这种精神一直影响徐润的一生。他一生从事实业六十年，有成功、有失败，但他不畏困难，不畏失败，一直保持这种精神境界。“其间囿于势，限于时，成者七八，不成者二三，开创伊始，虽殚竭经营，集群策群力以从事，往往垂成中止，雨翁则未尝告劳焉。”^③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上海影响较大，因为上海是从事商业的总枢，“以致风声鹤唳，一日数惊，商市奇缺，周转不灵，致败坏几不可收拾，艰难创就，尽付东流，他人处之，当不知如何愤懑矣，乃雨翁自书一联云：‘放宽肚皮袋气，咬紧牙根吃亏’。”^④ 后虽年事已高，亦老当益壮，奉李文忠公之命创办矿业，其艰难备尝，不言而喻，“创建平、续办永平，兼热河合办各矿，榆关十载，马瘃仆痛，艰苦备尝。”^⑤ 但他始终保持一种健康的心态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徐润在买办时期和自营商业活动中形成的创业精神对他一生的事业开创很有裨益，终生受用，在以后的商业活动中，虽几经挫折，亦不气馁，在接管轮船招商局、创办矿业的过程中虽有艰苦，亦有人言，但他始终如一，奋斗不止。即使七十三岁高龄，亦“不容少懈，其精神矍铄，诚非常人所能及”。“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⑥

（二）徐润虽然年事已高和身患疾病，但他为了中国近代矿业不畏辛苦进行实地调研的企业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宝贵精神财富

徐润从1887年开始，二十多年奔波大江南北的各个矿区，为中国近代矿业的发展进行实地勘探与开采，对中国近代矿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887年，从唐山出发，勘察平泉和孤山子的铜矿和银矿。“光绪十三年，丁亥，……秋间唐景翁、刘吉翁〔刘吉六〕与余从唐山出喜峰口，初至平泉铜矿，后抵烟筒山，住一礼拜，细探大概情形。”^⑦ 1888年从天津出发，再勘孤山子银矿。“光绪十四年四月初三日，余与黄紫珊兄游热河之孤山子，出古北口。……十二日到孤山子，住两日。”^⑧

① 前揭《洋务运动》，第8册，第88页。

②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页。

③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序》，第2页。

④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序》，第2页。

⑤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序》，第2页。

⑥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序》，第2页。

⑦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42页。

⑧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43-44页。

一点半钟晤爵治——即哲尔者——与其夫人，美医生打伦敦、德架司、阿弟、赖安、毕德格（号子明）。同往验化银炉厂各处。十三日晨勘磨沙各厂。十点钟偕哲尔者落垅口，约深四百尺，往西落四百六十尺，验得砂线厚约两尺。复往各横垅验看，转回大井，直落五百尺。各段均取小辨，石坚水少，苗质各有厚薄。知下土糟常出粉头、银线、银粒，惜乎不多。着李把头立取少许。是晚即託张君星舟抄列各项开销与各工账略。又託罗、谢两君抄列配镕化各料。十四日验罗岳生兄小镕化十种，配料另录。再到各处一勘。回拜毕、哲各西友，均谈论良久。夜间与仲三、达三诸君详论历年本山大旨^①。

徐润在孤山子和外籍矿师哲尔者亲自下到四百尺、四百六十尺和五百尺深的矿井了解矿苗的厚薄和矿石的质量，又与外国矿师哲尔者及其夫人，美医生打伦敦、德架司、阿弟、赖安、毕德格（号子明）等同往验化银炉厂各处，并查看银矿配料与化验结果，注重与外国矿师哲尔者、毕德格和中国工作人员徐仲三、姜陈达山的商谈，同时托张星舟抄列各项开销与各工账略以便备查。同年徐润还北上迁安铁矿，南下基隆煤矿勘察与协办煤铁矿。“光绪十四年，……秋间与唐景翁、刘吉翁同验迁安老铁厂。”^② 又“奉刘省三爵帅调赴台湾，派充鸡笼煤矿差事，坐飞捷船去，仅住一月，水土不服，抱病而回去。”^③

1887年以后近二十年，徐润奔波于祖国大江南北的各个矿区，为中国近代矿业的发展辛勤地、不辞劳苦地实地勘探矿藏，或主持与协助开采各个矿区的矿产。1889年，筹办家乡香山的天华银矿，“光绪十五年己丑。……接办香山县天华银矿。”^④ 后“全盘筹计，谓非有大资本百万，断难望成，遂决意停办。”^⑤ 1890年赴潭州银矿“光绪十六年庚寅……余在潭州银矿。”^⑥ 1891年，倡办建平金矿出塞，“光绪十七年岁辛卯，余倡办建平金矿，偕孙君慎钦等出塞察勘。”^⑦ 1892年，徐润从冷口出发，勘验承德府所属各地矿产，“冬十月初九日与邵松乔自唐山出关，验承德府所属平泉、建昌、朝阳、赤峰各金银矿山。”^⑧ 六年内先

① 前揭《洋务运动》，第8册，第88页。

②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42页。

③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43页。

④ 前揭《洋务运动》，第8册，第136页。

⑤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47页。

⑥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47页。

⑦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50页。

⑧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57页。

后四次勘察塞北矿产，“孤山子，烟筒山，热河，六年之内，到过四次。”^① 1893至1896年筹办和委办建平金矿。1892年，与唐廷枢等创办建平金矿。“光绪十八年壬辰……奉北洋大臣李札委会办建平金矿，五月开办。”^② 为创办建平金矿，徐润在偏僻、荒凉、寒冷的关外一呆就是三年，直到建平金矿办出规模并有一定产量。“现计总分各局约有四千余人籍此养生。前年采见金二千余两，至去年统计出金七千二百余两。”^③ 除此之外，徐润还会办开平煤矿（1891年）、林西矿，兼理承平三山银矿。“春奉李傅相札委复会办开平局林西煤矿，并管轮船四艘，兼理承平三山银矿。”^④

徐润致力于中国矿业近二十年，不顾年老、多病和恶劣的自然环境，马不停蹄，劳累奔波于关内关外、大江南北各矿区，这需要惊人的毅力与坚韧不拔的勇气。他1887年第一次出关已年届五十，1892年55岁会办建平金矿，1896年59岁筹办永平金矿，因年岁已高带来的体力不支是徐润需克服的第一问题，所以下到矿井深处，年轻人只休息一次，他却需要四次。“余下去时停歇四次，述三兄停歇一次，到底年轻。”^⑤ 而路险、风大、天寒、地冷、冰冻则是需要克服的恶劣环境。下面摘录徐润在自述年谱中描述的部分句子，即可见一斑，“早启动身正遇大风，寒冷异常，车马难行，”“兼之道路难行，迨上坡冈，冷苦益甚。查口里口外冷度迥异，此地势之愈高天气愈冷。”“道路凹凸，非沟即岭”“层冰凝结，驾轿之骡亦疲不能前，驼夫稍不留心，将轿滑跌两次，颇险。”“十四日又大风，冷甚，在房屋中不觉，一到院外殊觉风如刀割。”^⑥ 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徐润的咳嗽症加重，有时又偶感风寒，但他全然不顾，仍带病坚持工作。“而余咳嗽之症益深矣。”^⑦ “是夜未食，觉有疾，竭力支持亦未声言，夜间仍传各把头问话。”^⑧

徐润从第一次出关近二十年备尝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路险、风大、天寒、地冷、冰冻等恶劣的环境和疾病缠身没有改变徐润致力于矿业的决心，实属难能可贵；他这种为了中国近代矿业不畏千辛万苦的实地调研的企业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宝贵精神财富。

①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69页。

② 前揭《洋务运动》，第8册，第146页。

③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77页。

④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76页。

⑤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65页。

⑥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64页。

⑦ 前揭《洋务运动》，第8册，第156页。

⑧ 前揭《洋务运动》，第8册，第158页。

（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决策又是徐润创业精神的显著表现

徐润在经营商业、航运业、矿业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决策。他的《拟兴滦州卞凉商务公司节略》就是最好的典范。徐润先考查西洋各国通商、致富、强兵、固本之道：“窃查西洋各国俱以通商致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国本固。”^①后调研承德、永平两府十四州有利于商业的地势、物产。“凡其地势物产有关于商务者，随时访查。”^②然后得出有九种物产有开发价值：土丝、棉花、高粱酒、白面、皮毛、桑皮纸、烟叶、花生、香木粉。并提出了九种物产的市场前景：“实中外必需之物。”^③提出设厂于滦州卞凉汀的三条理由：一是卞凉汀是滦州下游的水陆码头；二是来往火车适中之地；三是工人易于招集。徐润概括为：“地势形便，工料减省，销路广达。”^④最后徐润论证了创立滦州卞凉商务公司的五条理由：“内地之商务由此兴；外洋之利权由此分；货由铁路运载，养路之费亦可增添；厘金关税亦可以增加；销路一广，出产益多，且可藉工作以糊口，于贫民生计亦为有益，是一举而数善备焉。”^⑤

徐润的创业精神来源于买办时期的主奴关系和寄人篱下的卑微，正是卑微的地位激发他刻苦好学，努力工作，百折不挠去面对现实，面对工作；也养成了忍让、宽容、乐观、豁达、奋进的性格品德。正是在这基础上形成了他在未来的航运业、矿业、民族实业中不畏千辛万苦；不畏年事已高和身患疾病，认真进行实地调研的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形成了他在经营商业、航运业、矿业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在调查研究、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科学决策的企业家的求真务实精神。这些都是作为实业家的徐润值得肯定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创新精神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就是集中体现在他要从事一种过去从未从事过的事业，必须勇于承担，勇于奉献；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应该放在企业家当时所处的时代去考察、去研究，这样对企业家的评价才是恰如其分的。

（一）徐润作为一个企业家，在于他敢于冒险，并勇于承担风险去从事从未从事过的事业

①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拟兴滦州卞凉商务公司节略》，第90页。

②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拟兴滦州卞凉商务公司节略》，第90页。

③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拟兴滦州卞凉商务公司节略》，第92页。

④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拟兴滦州卞凉商务公司节略》，第92页。

⑤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拟兴滦州卞凉商务公司节略》，第92页。

法国的萨伊、英国的马昌·贝尔和美国的保罗·萨谬尔森，特别是美国的熊彼特充分地论述了企业家的这一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基本职能是创新，企业家应敢冒创新的风险，而且勇于承担失败的风险。

徐润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时代，轮船、铁路、电讯、股份制、保险等都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新事物，但他敢冒风险，敢于从事前人从未从事的事业。“创招商轮船局，仁和、济和保险公司，开平、林西煤矿，塘沽种植公司，续办承平、三山银矿。”^① 轮船、保险、煤矿、银矿、种植都是中国近代首创。徐润和他的好友唐廷枢敢于克服困难，开中国航运业、采矿业、保险业、种植业之先河。“将旗昌、金利源汽船全公司买受，”^② “中国之龙旗飘扬于英京及利物浦、南洋各岛、檀香山、日本等处。”^③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政治和经济侵略双重压力，徐润敢于抗争、敢于冒险、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收购，减少了航运业的强大竞争对手；并积极开展国际贸易，中国轮船开辟英国、南洋、美国、日本的航线并进行海外贸易，这些都是中国近代抗争下的经济外交的成功典范。

徐润自己还创办国文书局、绸庄、布庄、典当、茶庄、客栈等，这些使他富极一时。但“其间囿于势、限于时，成者七八，不成者二三，开创伊始，虽殚竭经营，集群策群力以从事，往往垂成中止，雨翁则未尝告劳焉。”^④ “成者七八，不成者二三”，严格地说来，作为自序，难免有夸大之辞，其间风险远远大于“二三”。就以中法战争之后，徐润的处境就可知一斑。“商市奇紧，周转不灵，致败坏几不可收拾。艰难创就，尽付东流。”^⑤ 徐润在地产方面非常成功，但最后也是“废之半途，毁于一旦，反致大亏，命耶运耶！抚今追昔，能不怆然，所谓有幸不幸者夫。”^⑥ 连最后挪欠招商局的十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六两白银也只能“向亲友告借船股八百八十三股归局抵消清楚，尚存余元六十九两九钱三今五厘亦无找回。”^⑦

纵然如此，徐润不仅敢从事冒险的事业，而且冒险失败后，也勇于承担风险。他虽备尝艰辛，但他最后并未被困难所压倒，不仅还清招商局的欠款，还得到李鸿章和清王朝的重新启用。而且把自己的事业由轮船航运业转向中国近代矿

①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序》，第1页。

②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序》，第1页。

③ 前揭《洋务运动》，第8册，第85页。

④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序》，第2页。

⑤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序》，第2页。

⑥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6页。

⑦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8页。

业，不顾高龄，仍创建了永平、热河等矿。“岁辛卯创建平，续办永平，兼热河合办各矿榆关十载，马瘡仆痛，艰苦备尝。”^①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甘愿风险，以苦为乐。企业家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企业家“寻找困难为改变而改变，以冒险为乐事”，企业家正是在不断冒险中寻求刺激并敢于创新成功的。^②

（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表现在对新事物的敏感性，能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思维、判断接受新事物，并不失时机地实施新的创新计划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为了创新的成功，“更主要的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它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③

1. 徐润作为 19 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企业家，他对新事物具有超乎寻常的敏感和好奇

他的《上海杂记》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记载当时中国近代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轮船码头、邮船公司、银行、制造厂、公司；税务、煤气灯、电灯、自来水、电报、电话、电车、火油、火柴、医院、学校等近代出现的航运业、金融业、制造业、电讯业、医疗、教育都有涉猎，都记载详细、并有考证。

同治九年（一八七一年），大北电报公司设立海线，始通至上海，后又通至日本长崎，又由长崎通至珲春。是年大东电报公司海线始通至香港，遂由香港与大北公司订立合同，乃由香港通至上海。同治十年（西一八七二年），创立中国电报，其时字码初次行用，其首次之线，设于同治十一年（西一八七三年），直至光绪十一年（西一八八四年）方有长线^④。

徐润对在中国设立最早的大北电报公司设立的时间，通达的地域，以及中国电报创立的时间，最早使用字码的时间及最早设立海底电报线的时间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和考证。

2. 徐润对新事物的敏感性不仅表现在他对新事物的敏感性高，更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善于接纳新事物，并抓住时机予以实施

关于股份制，徐润在买办期间就曾实践过，但适用于中国大型的民族工业则

①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序》，第 2 页。

② 前揭《经济发展理论》，第 174 页。

③ 前揭《经济发展理论》，第 174 页。

④ 前揭《上海杂记》，第 11 页。

始于1873年轮船招商局改制时。1873年徐润会办轮船招商局，和总办唐廷枢一起利用自己的声誉和资金积累优势迅速筹集百万股金，后又突破二百万大关。“光绪八年招足一百万两，九年招足二百万两。职道首先附股，前后计之共四千八百股，合计银四十八万两，此外设法招徕各亲友之入股者，亦不下五六十万两，是招股已经手过半。于人心未甚深信之际，集此巨资，颇非易易，此不能谓为无功者一也。”^①

保险是徐润善于接纳新事物的又一突出表现。保险最早是伴随着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沿海通商口岸开放而逐渐在中国推行的。外国资本主义在沿海通商口岸建立船坞、工厂、洋行，开始近代航运业等，为了减少风险而设立保险公司，开展保险业务。买办们在洋行的工作中不仅很快接受了保险，而且很快对保险的便利和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曾有一度我是这个口岸唯一的水险业代理人，有些买办，特别是宝顺洋行的买办阿彭（Apang）经常以他自己的名字和他自己的账号到我这里保险，并且都是大笔的。”^② 这是一位英国商人回忆时说的一段话，它说明买办很早就参与中国近代保险业。

徐润和唐廷枢在创办近代航运业的过程中，从夺回民族利益、维护民族航运业的大计出发，也从企业自身的利益出发，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开创了近代水险业。1876年徐润、唐廷枢创办仁和水险公司，1878年创办济和水险公司。1886年仁和、济和合并更名为仁济和保险有限公司。保险业的创办，不仅“获利颇厚”，^③ 而且能维护自己的航运业，打击洋人的嚣张气焰。“因长江江孚轮船用我粤人张慎之为船主，洋商嫉妒，不允保险，是以多设一公司，合共资本百万两，为自保之计。自是而后，洋商遂无异言，如旧照保矣。”^④

（三）熊彼特的经济理论认为社会环境对企业家的创业有阻挠作用，“这个反作用可能首先通过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存在的障碍所表现出来”，同时受到“创新”威胁的各个集团对采取“新行为的企业家采取抵制。”^⑤

19世纪中后期，徐润作为企业家遇到了来自清王朝内部顽固势力的阻挠，也有受到创新威胁的代表旧船主势力的官僚和外国航运势力的阻挠。所以徐润的创新需要冲破双重的阻挠。“京朝士大夫不顾念中外大局，讼言船政之非，总署心知其理，而怵于成效之难，亦遂湮溺依违。”^⑥ 对这种反对和阻挠，和徐润一

①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86-87页。

② North China Herald, 1884年11月19日，第578页。

③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24页。

④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25页。

⑤ 前揭《经济发展理论》，第173页。

⑥ 前揭《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3卷，第2页。

起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唐廷枢更是深有感慨：

头两年洋人忌心颇重，或谓局无洋经理，断难自立；或讥我股本无多，决难久长。第四年归并旗昌之后，洋人忌心更重，倾轧之言愈多，尚无足怪。惟出于意外者，竟有我国之人，以耳代目，受渠所愚，亦同声相和，遂令有股人心寒^①。

徐润面对来自内外势力的阻挠，并不气馁，特别是好友唐廷枢北上创办开平煤矿和外出经营之时，他独力支撑招商局的事业。徐润顶住了来自各方的阻力，不仅不断壮大和发展了民族资本，而且在收回利权的经济外交中也颇有建树。1872年轮船招商局创办之时，仅有轮船4艘，2319吨。到1883年，已有轮船26艘，33378吨。十一年招商局船只增长了5倍半，吨位增长了14倍。短短十年间，经营规模不断壮大，运输能力不断增强，建成了一支当时中国最大的商业船队。1873年轮船招商局创办之前，洋人在华航运公司每年在华得利银787.7万余两，轮船招商局开办三年中，与洋人争利，洋船因少装货客，使洋商少得利1.3万两。招商局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仅站稳了脚跟，稳住了阵脚；而且在与外洋的竞争中，频频取胜，买下曾经在中国创立最早、大发横财、不可一世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并迫使太古、怡和两次签订有利于招商局的《齐价合同》。

总之19世纪民族实业家徐润，其创新首先表现在从事了以前中国从未从事过的轮船、保险、股份制等；其次还凭一个企业家的敏感把股份制和保险业办得非常成功。徐润的创新受到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影响，有来自国内顽固势力和国外航运公司的双重阻挠，但这些并未使企业家徐润屈服，而是独立支撑民族的航运业，不仅成倍成十倍地扩大轮船航运业的民族资本；而且在自己航运势力居劣势的情况下取得近代经济外交的胜利，为国家、民族争回利权。企业家徐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并不高的前提下，他的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他成功经营近代民族航运业的动力；这是他成功的根本所在，也就是他“个人的首创精神和企业家功能在日益普及的风气中的运用。”^②

① 《招商局史稿》抄本，转引自前揭《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1840—1895），第824页。

② Arnold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1908, pp. 574 - 575。

三、民族精神

徐润结束买办生涯后转变为民族资本家，走“实业救国”之路，为国家的强大，民族的振兴和中国工业的近代化，奋发努力并作出重要贡献，这就是半殖民地时期可贵的民族精神。

（一）徐润民族精神的形成开始于在洋行任买办期间

徐润从农村走向大城市，走向外国资本家开设的洋行，不仅感到民族之间的不平等，而且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施加于中国的侵略伎俩，也亲身感受到在替洋人经营经济活动中，大量钱财被流失，被掠走，其骨子中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

徐润早在买办期间就已形成他的民族意识，1852年徐润15岁随叔父徐荣村到达上海。上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成为十里洋场，租界、洋行林立，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焦点。徐润学艺的亦昌号、丝茶号“当时为南北大道咽喉之区”^①，英、法、美相继在这里开辟租界。英租界初辖范围“北面李家庄，即今日之北京路，东面黄埔（浦）江，南面洋泾浜，西面即今之福建路一带长滨。”^②“又复占及浦北地，自跨有苏州河立为美租界”^③，“今美界已占至宝山县界矣”^④；“又复于泥城桥之西，老闸桥之北占为公共租界，一切布置均不亚于英租界。”^⑤随着租界的建立，外国资本主义的洋行接踵而来，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上海最早的银行是丽如银行，“于道光二十九年（1805）交易生理，惟一、二年前已成立矣。”^⑥“今五马路边，有指望洋行”，“今三井洋行之南”“有比利士勿洋行，洋泾桥边有裕丰洋行”，“继有天祥、长利、新旗昌、公易、华记、新关、宝顺、李百里、丽如、裕记、广源、仁记、和记、怡和等接踵而起”，“英商兆丰洋行就该处建造外大桥。”^⑦1886年第一部银行名簿记载有十家银行：阿加刺、利中、利商、汇泉、麦加利、汇隆、有利、法兰西、汇丰、丽如。^⑧近20家外国洋行在短时间就在上海建立起来，迅速开展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与掠夺。

①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页。

② 前揭《上海杂记》，第1-2页。

③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4页。

④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4页。

⑤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4页。

⑥ 前揭《上海杂记》，第8页。

⑦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4页。

⑧ 前揭《上海杂记》，第8页。

此外,帝国主义还在租界建立各种殖民机构,进行殖民统治。1894年设立沪道洋务署,1853年设立巡捕队,1854年设立工部局,1863年设立会审公堂,1865年设立英按察使署,1871年设立监狱,1875年开创律师制。^①帝国主义利用租界加紧进行经济侵略。1825年设立大英邮船公司,1854年自设税务司,1863年旗昌洋行创立上海轮船公司,1865年设立虹口码头,1886年设德国公司,1888年设立上海业广房产公司,1891年开设公共市场。^②

徐润面对列强的侵略,既愤慨,又担心。“然尚不知厌足,日谋扩充,日图推广”。这样中华民族“政令不行,主权日削,曷胜浩叹”。^③早期的民族意识对徐润以后产生深刻的影响。

1873年旗昌洋行极力地拉拢他任上海买办,他不但拒绝旗昌洋行的要求,而且毅然投身到民族工业中,与好友唐廷枢改组轮船招商局这一中国近代第一个最大的国有民族企业。他和唐廷枢在改组轮船招商局的过程总是时刻对洋行提高警惕。《轮船招商局局规》明确规定“凡有股份者如欲将股份单转售别人,先须先赴本局告明,以使注册。惟只准售于华商。”^④而“不准让与洋人”“以杜绝洋人借名之弊”,这就是从制度上保证招商局的主权只归中国人所有,预防招商局落入洋人之手。1873年《徐润致盛宣怀函》就表达得更为明确“(‘永宁’‘满洲’)将业剔除洋人股份,即可请领牌照,换用旗式。”^⑤这种朴素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发展就是维护国家民族的主权,与洋商抗争,走“实业救国”之路,徐润在后来的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签订《齐价合同》等方面都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上,取于抗争,敢于收回国家的利权,这就是买办期间形成的民族意识的发扬光大。

(二) 收购美旗昌轮船公司,是徐润民族精神在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体现

收购美旗昌轮船公司,壮大了轮船招商局自身的实利,增强了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的能力;同时巧妙地收回了中国的利权;也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和与世界市场经济接轨。特别是收购美旗昌轮船公司使轮船招商局失去了一个强大竞争对手,从而形成了轮船招商局、太古、怡和三足鼎立的局面。

“轮船招商局由于购下美国的船队,它作为一家最重要的轮船公司出现于中国水域。”^⑥从此以后,招商局的运力从11 854.88吨上升到30 526.18吨,扩大

① 前揭《上海杂记》,第2-4页。

② 前揭《上海杂记》,第5-10页。

③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4页。

④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4页。

⑤ 前揭《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第5页。

⑥ 前揭《李鸿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第273页。

了一倍半，为其进一步开拓业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还增加了地势优越的轮船码头，特别像金利源这样的最佳位置的码头，这一切都必然大大增强轮船招商局与外商的竞争能力。“当年盈利额就由 16.1 万两增至 35.9 万两，次年增为 44.2 万两。”^①“招商局自 1877 年收购旗昌后，在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吨位统计中，中国轮船吨位便突增至四百万吨左右，占总数的 36.7%。”^②这样大大夯实了中国航运业的基础，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

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巧妙地收回了中国的利权。1876 年轮船招商局以 220 万两买下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产业，包括 16 艘轮船和长江各埠以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旗昌轮船公司建在我国沿海及长江各处口岸的码头是当年列强凭籍不平等约，以不合理的价格占用的。现在唐廷枢、徐润等巧妙地利用时机，通过国际惯例，由担文律师一手经理，归商局接管，把属于祖国的黄金宝地收回来。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在软弱无能的满清政府根本不可能收回中国失去的利权的前提下，徐润等通过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却巧妙地收回了中国的利权，这是经济外交中的爱国壮举。

（三）创办保险业是徐润民族精神在企业创新中的显著体现

徐润保险业的创办起到了抵制西方对中国保险业的入侵和维护民族利权的积极作用。鸦片战争后，外国洋行伴随侵略者的足迹纷纷落户中国，19 世纪中期，上海一地的外国洋行就达 160 多家，洋行纷纷在中国建立保险公司，当时有名的就有 7 家，即谏当、於仁、扬子、保家行、华商、中国、中日水险，其资本总额达 57 万英镑。随着经济侵略的加剧，形成了外国保险在华一统天下的局面，外国保险公司对中国轮船、企业刁难、高额勒索保险费、拒保事件时有发生。“上海各洋商保险行，因伊敦船用中国龙旗及局中双鱼旗号，均不肯保险，……未始非受洋商保险行垄断之刺激，而有以玉成之也。”^③“招商局轮船向在洋商保家行保险，惟每船限保银六万两，其超过六万两之额，当由局中自行保险……值十万两之船，每年保费须缴纳一万两有零。”^④初次向怡和、保安投保时，仅以 15 天为限，条件极为苛刻。徐润等为了打破外国保险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了便于华商投保，自创中国保险，就在 1875 年公告颁布后半年，唐廷枢、徐润就创办了仁和水险公司和济和水险公司。“光绪二年丙子……又与唐景星翁、陈茂南翁、李积善堂等集股本 25 万两开设仁和水险公司，试办一年，获利颇厚。继又添招

① 前揭《轮船招商局与中国近代化》，载《中国近代史》，第 60 页。

② 前揭《晚清洋务运动研究》，第 166 页。

③ 前揭《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第 19 页。

④ 前揭《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第 19 页。

二十五万，共股本五十万两。”^①“试办仁和水险公司，生意颇旺可得利三、四分”^②。到了光绪四年（1878），轮船招商局任命留学英国的广东人张慎之为“江孚”号船长，洋商嫉妒，不给予保险，所以，徐润、唐廷枢等决定多设一保险公司，即济和水险公司，集股50万两，共1百万两。正是有了这百万股本，得利不少，而怡和、太古等英商轮船保险公司此后不再拒绝华船保险^③。

（四）两次《齐价合同》的签订，是徐润等运用经济外交的手段维护民族利益的典范

在当年腐朽积弱的满清统治下，在不平等条约的钳制下，招商局的实力，在技术装备、资金运作、公司组织等方面，明显地不如人，……在这种势力并不等同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谈判和签约的方式迫使技术精良、资金充裕的外国轮船公司同意在利益分配处于劣势的前提下而签订《齐价合同》，其成就实属难能可贵，这是徐润民族精神在经济外交中的集中体现。事实上在这场经济外交中，招商局处于有利地位。“据悉三家最大的长江轮船公司经理已经达成联盟收费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运价微有提高，并按下列比例分配：‘招商局比太古轮船公司多收入10%；太古比怡和多收入20%。此项协议将于七月一日生效。’”^④从1883年轮船行走各码头每百次应沾水脚比例表（表5-1）来看，招商局占了明显的优势。^⑤

徐润致力于中国近代矿业以挽救民族危机、争回利权作为出发点，发扬不畏劳苦、敢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依靠政府和地方官员的支持，采用股份筹集开矿基金，采用机器生产和现代交通运输，引进外国的开矿技术和技术人员，走出了一条中国矿业近代化之路，这不仅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更有益于国富民强。

关于中国近代矿业之路和兴办矿业产生的效果郑观应在吸取泰西各国的经验之后作了这样的论述，他认为：“国家之督率也严，官商之集办也易，士民之期望也切，矿师之辨别也真。有机器以代人工，有铁路以资转运，故能钩深索隐，兴美利于无穷。”^⑥“矿务之兴，有益于公私，上下者非浅鲜也。”^⑦19世纪70年代，民族矛盾上升，以矿业危机和边疆危机为主体的民族危机加剧，财政危机日

①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24页。

②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7页。

③ 前揭《徐愚斋自叙年谱》，第25页。

④ 《字林西报》，1882年6月23日，第575页。

⑤ 前揭《晚清洋务运动研究》，第192页。又见上图未刊：据《局、怡、太轮船行走各码头每百次应沾水脚三家订立合同》改制。

⑥ 前揭《郑观应集》，上册，第702页。

⑦ 前揭《郑观应集》，上册，第702页。

益严重，于是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掀起了一股以煤炭开采、金属采掘和冶炼业为中心内容的矿业救国的热潮。徐润就是致力于中国近代矿业，挽救危机，争回利权的杰出代表。

徐润在买办时期便亲自感受到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施加于中国的侵略伎俩，也亲身感受到在替洋人经营经济活动中，民族的经济利益被掠夺，其骨子中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其在后来的民族航运业、保险业、矿业和经济外交中能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以挽救危机，争回利权作为出发；通过创办航运业、保险业、矿业；通过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和签订《齐价合同》，成功地收回国家的利权，争回了民族利益。这就是半殖民地实业家徐润宝贵的民族精神。

第二节 徐润创办民族工商业的意义与作用

徐润投资与经营的民族事业始于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商业、地产；中经 19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的轮船业、矿业；到 20 世纪初，他创办的民族工业进入成熟期。纵观徐润一生之事业，唯地产业贯穿其一生。然而，在黑夜难眠的旧中国，作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对立面的徐润民族资本创办或投资的商业、地产、轮船、矿业、工业及教育、文化等，无疑具有民族性。

一、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市场竞争，具有明显的民族性

徐润创办的民族工商业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当时的世界已有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度，西方国家对东方不仅进行商品输入，而且也加速进行资本输出，世界经济市场联成一体。因此，徐润经营的茶业、房地产业、民营企业不仅要与国内工商企业竞争，更重要的是作为国际经济市场的一部分，参与国际经济市场的竞争，争取民族市场和民族利润，所以，徐润创办的民族工商业及其经济运作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与国际性。

（一）徐润经营茶业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市场竞争

徐润经营茶业等商业活动近十年，在茶业等方面已获得了相当成功，大获其利，到 19 世纪 70 年代，他经营的宝源祥茶栈得到上海钱庄通融的款项，经常在二百万两银以上。徐润经营的茶业等商业业务规模扩大，势必与资本主义列强在华经营的商业发生矛盾。早在 1667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中国搜集茶种到英国试种，两个世纪过去，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方法也有创新，加之不用纳税，英国茶叶已经与中国形成激烈竞争。